

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

张珊珍

内容提要 陈立夫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八年抗战期间,陈立夫担任近 7 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战争艰难岁月中,陈立夫在拟订战时教育政策、方针,迁播高校,增设、改进中国高等教育,推进中等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发展边疆教育和华侨教育,以及救济、培养与征召青年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使中国教育不仅没有因战争而停顿,相反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陈立夫执掌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教育部门维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实行思想统制,防共反共,抵制“赤化”,逆时代进步大潮。功过是非,历史会给予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 陈立夫 抗战 教育 国民政府

陈立夫(1900—2002 年),原名祖燕,字立夫,浙江吴兴人。因其叔父陈其美为国民党元老,其兄陈果夫为蒋介石近臣,1925 年,留美归国年仅 25 岁的陈立夫弃工从政,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从此平步青云,在长达 20 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职权扩大到政界、军界、教育界、文化界乃至经济界,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年来,陈立夫因其与兄陈果夫组建“国民党中央俱乐部”(即 CC)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而扬名,但很少有人关注他曾经在八年抗战中出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而他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是非功过则更加鲜为人知。本文试图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此做一番初步的介绍与探讨。

1937 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日军来势凶猛,短短的几个月

间,平、津、京、沪相继失守,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战争使中国教育陷于混乱之中。“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损失之重,实难数计”。^①在此紧急关头,初迁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走马换将,重振旗鼓,委任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1938年3月7日,陈立夫在重庆披挂上阵,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1938年3月—1944年11月)的教育部长生涯。

一 战时教育政策、方针与方案的拟订

初到任上,陈立夫首先就面临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何制定战时教育政策以支撑战时的中国教育?当时在教育界有两种强烈的声音。一部分人士受“焦土抗战”主张的影响,提出一切为了战争,教育也不能例外,非常时期应实施战时教育政策。所谓战时教育,就是“一种适应战时体制或状态,而促进民族中成员身心发展,借以培养战时所需国力的工具,推动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的工具”。^②实施这种教育政策,要求“高中以上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③可见,他们主张废弃正规教育,以短期培训的方式,迅速造就战争人才。另一些人士则提出:“我国过去的正规教育,在平时已有改造之必要;在战时,更非彻底改造不可”,主张“须以远大目标,作标本兼治的筹划”。所谓治标,是指“应目前迫切的需要,而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编第2章,第8页。

^② 吴景宏:《战时高等教育问题论战的总检讨》,《教育杂志》1939年第1期。

^③ 吴景宏:《战时高等教育问题论战的总检讨》,《教育杂志》1939年第1期。

设施各种暂时的办法,谋补救因抗战而发生的种种事实上的困难”;所谓治本,是指“对整个教育事业,加以整理、充实、调整、改进、扩充,为根本远大之谋,以期应付长期抗战,适应建国需要”。^①

陈立夫对以上两种建议均不以为然。一方面,陈立夫认为根据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国策,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能因为战争而中断,“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衰亡之危机”。^②因而,他断然否定了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政策的建议,明确表示:“在长期抗战过程之中,更不许孤注一掷于俄顷之间,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③另一方面,陈立夫同样拒绝从根本上改革旧的教育体制的主张。他极力维护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8月发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强调“镇静”与“秩序”,“谋教育制度之持续维持”。^④

为研究战时教育,以冀对战争非常时期的全国教育有个通盘筹措和长远规划,同时也为了能够及时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1938年2月,陈立夫组织成立了战时教育问题研究会,由顾毓秀任主任委员,聘请朱家骅、谷正纲、陈布雷、陶希圣、陶百川等政界、教育界著名人士23人为委员。^⑤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陈立夫的提议,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突出了关于战时教

① 陈礼江:《论战时教育》,《教育通讯》1938年第7期,第3页。

② 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教育通讯》1938年创刊号,第13页。

③ 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教育通讯》1938年创刊号,第14页。

④ 陈立夫:《抗战一年来之教育》,《教育通讯》第17期,第12页。

⑤ 《教育通讯》1938年创刊号,第3页。

育的 4 项纲领：“（二十九）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①根据这个 4 项纲领，陈立夫又主持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其中包括 9 大方针和 17 项实施要点。9 大方针是：“（1）三育并进；（2）文武合一；（3）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进；（4）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5）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6）对吾国文化固有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7）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8）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以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9）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社会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②至于 17 项实施要点，则对于学制、学校迁移与设置、师资训练、课程教程、训育、军训、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经费、留学政策、最高学术审议机构、边疆与华侨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等，均作了具体规定。

1939 年 3 月 4 日，陈立夫在重庆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请蒋介石莅会致词。蒋介石在会上声明：“我们决不能说教育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来不管外面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

^①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教育部门）》，《革命文献》第 58 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第 25 页。

^② 《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革命文献》第 58 辑，第 26—27 页。

有的现代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而且尤其在抗战期间,更需要着重各种基础教育……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①“战时应作平时看”,蒋介石的“训词”几乎是一锤定音,结束了教育界关于战时教育的争论,也给初掌教育的陈立夫以极大的支持。

二 高等院校的迁播、增设与改革

抗战伊始,战火迅速蔓延,为保存和延续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为了高等学校不被敌伪沾染,当务之急是抢救各大高校,撤离战区。陈立夫当机立断,将高校内迁作为教育部当时的主要工作,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中外教育史上空前的大迁徙。

战前,中国的高等学校大多集中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沿江一带以及平津两地,在日军炮火中,这些地区首当其冲,最先陷落。情势紧急,在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华北、东南沿海各大高校一齐向西南、西北搬迁。据教育部1939年的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战事初起时,因日军占领被迫迁移后方的高校是52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的25所,停办17所。余下14所学校,或是原设后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会大学当时能在沦陷区继续办学。^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进一步恶化,所有原先迁入上海租界与香港以及原在租界开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大学,相继关闭。教师学生有的迁至后方,转入其他学校,有的异地继续办学。原先设在后方各省的高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编第4章,第53页。

② 《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8辑,第60页。

校,因躲避敌机轰炸,也被迫从城市迁到农村。实际上,战时 108 所高校中,只有新疆文理学院一所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陈立夫后来回忆,如此众多的高校纷纷搬迁,“教育部对于此等学校之迁移、接济、设立地点、筹措应变及经常费用,以及后方被炸学校校舍和图书馆之休整与补充等,无时不在紧急应付情况之下……其工作之艰巨,实非笔墨所能描述”。^①不仅如此,因战事变化,当时许多高校在撤退中是一迁数迁,颠沛流离。如浙江大学先迁往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吉安,又迁至广西宜山,最后到贵州遵义;中山大学一迁广西龙州,再迁云南澄江,复课不久,又迁到广东坪石。迁校次数最多的还是广东文理学院,一迁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连县,八迁罗定。迁移最远的是当时的北大、南开与清华三校。先迁湖南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②但开课仅 3 个月,日军进逼,再度搬迁至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长途跋涉,山高路远,异常艰辛。对此胡适曾感慨“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③全国高校几度举迁,期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然而,绝大部分高校虽辗转千里,却得以保持完整,烽火漫天中弦诵不绝,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大无畏精神。这其中,教育部的精心筹谋、密切配合,部长陈立夫的劳苦功高自不待言。

在战争年代资金短缺的困境中,陈立夫始终坚守“教育不可一日中断”的信念,力求“学校数量不仅不应减编,并且依据需

^① 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抗战岁月》,台湾《中央日报》编印,1985 年版,第 146 页。

^② 郭冠球:《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文史资料》1989 年 6 月。

^③ 《益世报》1946 年 11 月 2 日。

要,还须相当扩展”。^①他在组织、指挥高校迁徙的同时,深入调查全国各大高校的基本情况,结合战时教育纲领,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作整体规划。首先,为保持名校的高水平,适当将一些学校合并,达成强强联合,确保中国教育的高水准。其次,加强师范院校的教学力量,增设高等师范院校,谋求教育的持续发展。陈立夫认为:“师范教育为教育的基础,要求教育的改造与改进必从师范教育做起。”^②他于1938年7月签发《师范学院规程》,1942年8月,又公布《修正师范学院规程》,在规范师范学院设立、组织和培养目标、课程的同时,增设师范学院,大量培养中学师资。从1938年开始,先在几所国立大学分设师范学院,随后在湖南创立了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此后,陆续增设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和湖北师范学院等。到抗战结束,全国的高等师范院校由1所增至11所。在校学生数从1938年的996名,增至1945年9062名。^③第三,为适应战争对工程、医药技术人才的急需,迅速创办了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工程技术学院,与此同时,各高校还相应增设了一些战时急需的专业,开设与抗战国防有关的课程,如航空工程、碉堡工程、军用结构、战时救护、毒气化学等。

陈立夫不仅重视增加战时大学的“量”,同时也相当关注改进大学教育的“质”。为提高战时教育的质量,陈立夫对高等教育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如实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统一大学教师评聘标准、统一大学课程设置标准、统一大学生学籍管理、改进毕业考试办法等,均成效显著。尤其是整理大学课程,意义深远。陈立夫

① 《中国教育史资料之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②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249页。

③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第1章,第37—38页。

在视察一些高等学校时发现,当时中国大学课程体制极其混乱,没有一定的标准,相同专业,课程难易程度却相差很大。更为严重的是,各大学均采用西方体制,有“德国制”、“法国制”、“英国制”和“美国制”,却惟独没有“中国制”。许多重要学科的研究,都使用外国语言,研究中引用的材料及例证,也都采自国外,似为研究中国的外国学生或研究外国的中国学生而设,而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的课程却极其缺乏。在陈立夫眼里,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他不禁感叹:“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① 陈立夫当即召集国内教育专家、各大学校长以及资深教授,专就大学课程问题商讨对策,于1938年9月推出统一的大学科目表,由教育部公布施行。当时确立的“大学课程整理之原则,约有三点:一、注重一般学术之基本原则,二、求各种课程之集中,避免支离庞杂,三、立一最低限度之标准,使大学毕业生有一定程度。大学课程整理之结果,有两种趋向可以看出,一为偏重文化陶冶,二为合于中国自己需要之课程比战前为多”。^② 根据这些原则,大学课程被分为“必修”与“选修”两种,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历史材料列入了必修科。许多年后,陈立夫在回忆往昔时依然为当年自己主持的这项工作感到欣慰,“使中国的大学像一座中国的大学,我排除了一切障碍,收回了‘文化租界’”。^③ 整理大学课程除规定科目外,另一关键就是拟订科目教材内容。1940年开始,教育部征集各院校各科目的教材纲要,邀请各科教授数百人,开会审议数百次,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43年编定各科教材纲要草案42种,颁发各院校参考试行。同年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

^①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251页。

^② 《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8辑,第63页。

^③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252页。

会,拟订编辑计划,分公开征求、特约撰写和采用成书3种办法,到1943年,共得大学教材163部。^①为调动教员积极性,促进教学和学术科研工作,即使在战争困难时期,教育部还是颁布各种教员奖助金办法,并从1941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著作发明及艺术奖励。^②这些举措直接催生了这一时期各高校教学科研上的累累硕果,仅西南联大就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以及王力的汉语语法理论,贺麟、汤用彤、金岳霖在哲学、逻辑学方面的成就。^③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的世界教坛上都是遥遥领先的。

统观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教育,较之战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努力建立了中国的教育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陈立夫当时的深谋远虑应该说是有成效的。

三 中等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推进

按照民国政府体制,教育部不直接主办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只是决定政策方针、制定法规,监督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办理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但战争的爆发却给教育部增添了额外的工作。

由于战区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沦陷区百姓举家搬迁,后方人口暴增。大批青少年移居后方,急于继续求学。而后方原本经济落后,教学基础设施差,根本无法容纳。此外,各地的教师撤到后方,无处立足,生活无着。1937年冬开始,教育部已经在后方各地

① 同上书,第253页。

② 《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8辑,第63页。

③ 参见范小方、李永铭著:《陈果夫与陈立夫》,武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设立临时中学^①,收容流亡师生以救一时之急,但终非长久之计。陈立夫上任后,指示教育部制定《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取消各校校名的“临时”二字。此后陆续创办国立中学 28 所,国立华侨中学 3 所,国立边疆学校 3 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附设中学 16 所,共 50 所;国立师范学校 1 所,国立边疆师范学校 9 所,国立华侨师范学校 2 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附设师范 1 所,共 22 所;另有各类职业学校 28 所。收容学生 5 万多人,安置战区中等学校教师数千。^②这是战争非常时期教育部直接开办中等教育的开端。这些国立中等学校的设立,不仅可以给战区的学生与教师提供就学就业的机会,而且由于这些学校的教员来自沿江沿海教学质量比较优秀的学校,由他们任教的学校,对于当时后方各省市原有的中学还有示范作用,对于改进一般中等学校的素质,也有贡献。在陈立夫的授意下,1938 年,教育部订立和颁布了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办法,“通令各省市依照人口、交通、经济等情形,分别划定:(一)普通中学(注意小学升学儿童之比例)、(二)师范学校(注意区内小学师资之需要)、(三)职业学校(注意配合地方经济与特产)等三类”。^③1942 年,又颁布《中等学校设校增班注意事项》,对具体实施作进一步指示。规定中等学校课程,也是陈立夫在战时改进中等教育的重要措施。除了在中等教育中添设战时特种教材和实施后方服务训练外,1940 年,教育部修订和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修订“三三制”中学课程,并将初中分甲乙两组:甲组作就业准备,乙组作升学准备;高中也分甲乙两组,甲组侧重理科,乙组侧重文科。又在高中第三年设简易职业科目,供高中学生有意就

^① 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3 页。

^② 《1937 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 58 辑第 67 页。

^③ 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抗战岁月》,第 149 页。

业者选修。^①

职业教育是国民时期中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为了培养后方建设所需的中级技术人才,教育部对职业教育尤为重视。1938年颁布《创办县级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翌年又公布《各省实验分区辅导职业学校办法大纲》,令各省市教育厅局,会同本省或外省公、私立大学、专科学校及有关生产建设、军事机关等就其所在地及所设科系的便利条件,辅导各科职业学校,编订教材、选择教本及改进教学方法。1942年,教育部再次下令颁布各省市编制该年度教育行政计划及教育文化经费概算原则,指定中等教育经费的分配,其中职业学校应占35%。^②直至抗战胜利前夕,教育部为了战后建设的需要,先后制定了若干个发展职业教育的计划和方案。如1944年3月的《海事职业教育设施方案》、《商船职业学校设置计划》等。1941年,教育部通令公立职业学校除一律免收学费外,应设置至少30%的公费名额;1944年,又规定职业学校各科学生享受公费待遇的比例,农工医科学生享受公费的比例高达80%。^③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当时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1938年陈立夫上任教育部长之前,全国仅有职业学校256所,学生31897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职业学校增加到517所,学生91278人,学校数增加一倍,学生人数增加近两倍。^④

国民教育在抗战前是中国各级教育中薄弱的一环。国民政府于1935年通令全国实施义务教育,但收效甚微。陈立夫到教

① 同上书,第149页。

②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8编第1章,第2页。

③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8编第1章,第7—11页。

④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8编第1章,第7页。

育部后，着手对国民教育作根本改造。一是制定并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下令各省于 1940 年 6 月起试行。此《纲领》目的在于配合 1940 年国民政府实施的“新县制”，规定推行“新县制”的县市，乡镇设六年制中心国民学校，保设四年制国民学校。^①要求各校均设儿童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6—12 岁儿童小学义务教育与 16—45 岁成人（包括妇女）的补习教育齐头并进。二是推出《国民教育法》取代原有的《小学校法》。《国民教育法》的推出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其中一些条款与原有的教育规定相左，遭遇了不少阻碍。陈立夫回忆：“我为了克服阻碍，在行政院陈述，在中央党部提案，并请国民参政会通过议案，最后经过立法院的决议，不知经过了多少说服工作，最后始克完成法律而奠定了国民教育新制度。”^② 1943 年，《国民教育法》经立法院通过正式实施。三是首次制定国民教育五年计划。1941—1945 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细分为三期，各规定明确的任务，为中国国民教育走上正规奠定了基础。关于国民教育的其他重要措施，尚有：制定强迫入学条例、改革初等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修订小学课程标准、改善和提高小学教师待遇等等。战时国民教育的成就不可忽视，据 1935—1936 年统计，全国入学儿童数占学龄儿童总数的 30% 强，到 1944 年，这一比率上升到 76% 强（统计来自当时已实施国民教育的 19 省）。^③ 1944 年，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学校法》将战时对于国民教育的创制，作了法律规定，对国民教育的长久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① 《1937 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 58 辑，第 73 页。

^②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 1994 年版，第 264 页。

^③ 《1937 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 58 辑，第 72、77 页。

在推进社会教育方面。陈立夫亦下了不少功夫。除了搬迁增设各级图书馆、博物馆，使大批图书文物幸免于战火之外，还以教育部的名义，创设音乐教育委员会、国立音乐学院、戏剧专科学校、中华交响乐团、艺术文物考察团等等，使战时的社会教育依然得以发展。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电化教育的创设。陈立夫在入主教育部之前，就特别提倡教育电影，曾与教育界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掌管教育部之后，他先在社会教育司增设主管电化教育的科室，并令各省设立电化教育辅导处。1942年创设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又组建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分赴19个省市巡回示范，到1944年，这样的工作队竟组建了52个之多。^①就中国国情而言，当时社会教育的重点是扫除文盲。抗战爆发后，教育部组织大批来自战区的中小学教师，在后方各大城市成立识字班，同时组织编印了初级民众读本及高级民众读本两种，大力推行识字教育。^②因配合抗战的需要，当时的教育方法多利用电影、话剧、歌咏、巡回施教车等，再加上新推出的国民教育制度的保障，扫盲效果比战前更为显著。1936年一年扫除文盲3121820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943年，一年达到10407612人。^③可谓成绩斐然。

四 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的开展

在发展国立中学、国民教育的同时，陈立夫也关注边疆教育和华侨教育的问题。

①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264页。

② 《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8辑，第86页。

③ 《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8辑，第89页。

抗战爆发后,边疆各省成为重要的根据地,文化教育亟待提高。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教育部提议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成为战时实施边疆教育的准绳。为了落实推广边疆教育,教育部直接接管原有的边疆学校,使边地教育纳入正轨。同时,大量增设各级边疆学校。从1939年开始,先后设国立边疆小学24所,国立边疆师范12所(内有师范附小14所),国立边疆中学3所,国立边疆职业学校9所,国立边疆专科学校2所。^①此外,积极推进边疆考察与研究工作,多次派遣边疆考察团进行实地考察;筹设边政学院、组建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制定边疆教育计划、组织编译少数民族教材等,使中国的边疆教育在这一时期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华侨出钱出力,贡献良多,但海外侨民教育却因战争扩大而深受影响,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地侨校毁于炮火,许多华侨学生被迫辍学。陈立夫认为教育部有承担设置侨校、安顿侨校员工的责任。他在国民党七中全会上提议《侨民教育推进方案》而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方案,陈立夫又拟订了《侨民教育实施纲要》,于1943年由行政院颁发实行。在整个抗战期间,教育部拨款资助从香港及越缅内迁的学校20余所,救济侨生14286人。资助侨校教职员,使“无一人流离失所”。^②除了妥善安置回归祖国的华侨师生外,教育部还在海外增设侨民小学5所。1940年起,又陆续在云南、广西设立华侨学校5所,并向广东省内学校拨款,增开50个班收容侨生。同时还在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增设侨生先修班,收容中学毕业的侨生。战时华侨教育的发展,对增进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很有帮助。

① 《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8辑,第94页。

② 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抗战岁月》,第152页。

五 青年学生的招致 救济 培养与征调

在战争的特殊年代出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深知青年对国家的特殊重要性。他认为：“战时对青年的工作，主要是争取青年。”这其中的一个考虑是：“大凡子女之能入中学或大学者，其家庭多半为中上之家，吾人若能在后方照料其子女之学业，其父兄决不为日伪所利用。”^①因此，从招致 救济到培养与征调，教育部对青年学生作了一系列统筹安排。

首先是招致青年。根据抗战初期的战况，教育部拟订了一个《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将沦陷区分为 50 个教育督导区，派战区教育督导专员主持，就地在地下设校，吸收沦陷区青年，给予抗日教育。1943 年增至 102 个区。这些教育督导专员工作相当危险，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共有 343 人牺牲。^②对无法在沦陷区进行教育的青年，实施“教养兼施”计划，在各地设站招收，由教育部拨款供给青年并安置入学。这一计划开始只是零星进行，随着战区的扩大以及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1940 年，在陈立夫的指挥下，教育部成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作大规模、有计划的青年招致工作。截止到 1943 年，共招收沦陷区青年 154000 多人。^③

其次是救济与培养青年。大批沦陷区青年来到后方，主要进入各类学校继续求学。然而，这部分青年大多遭受家园被毁、亲人罹难的厄运，现又背井离乡，陷入生活无着的困境。陈立夫

① 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抗战岁月》，第 152 页。

②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 1994 年版，第 287 页。

③ 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抗战岁月》，第 153 页。

认为：“对这班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①，才能为国家保养青年，同时争取民心。于是，他以教育部的名义，建议建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制度，对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生活无着的学生，由政府提供贷学金，以维持基本日常生活。很显然，这是一笔极大的费用。在当时战火遍燃，国家税收锐减而军费开支浩大的情况下，陈立夫的建议，立刻遭到反对意见。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首先反对，陈立夫多方斡旋，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才得以实施。^② 1941 年 7 月，教育部颁布了《国立中等以上学校贷金暂行规则》，同时还公布了《省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规则》、《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规则》等有关学生贷金的规定。其基本原则为救济战区缺乏生活来源的学生，鼓励他们安心学习。以后学生贷金覆盖范围逐步扩大，非战区学生因家庭困难也享受到这种待遇。1943 年起，因法币贬值以及学生偿还困难等原因，转而实行《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市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改为公费制度。凡师范、医药、工各系科学生享受甲种公费待遇，免缴学膳费，并领取其他补助；理学院各系科学生以 80% 享受乙种公费生待遇，即免膳食费……凡来自沦陷区（包括侨生）家境贫寒的学生，或公教人员的子女并且成绩优良者，或原籍在蒙古、西藏、新疆的学生，尽先给予公费待遇。^③ “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每年常在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④ 此项支出费用浩大，几乎超过当时全部教育文化经费的一半。

① 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抗战岁月》，第 152 页。

② 参见刘敬坤：《抗战时期陈孔关于学生贷金的争议》，《民国春秋》1998 年第 1 期。

③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2 编第 3 章，第 24 页。

④ 《1937 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有关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 58 辑，第 61 页。

但是，在陈立夫看来，依然非常值得的。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认为：“费用虽大，但是成就甚著，据统计，战时由中学以至大专学校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者，共达 12 万 8 千余人之多。此等兼是国家不可少之人才。凡是现在国内外五十岁以上之社会中坚分子，几无人未受贷金或公费之惠。如无贷金及公费制度，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学，将为国家一大损失。”^①

第三是有步骤、有计划地征调青年。抗战伊始，在群情激愤中，许多有志青年纷纷要求从军抗日，社会上也有人主张，及龄大专院校青年一律照壮丁抽签办法征召入伍。陈立夫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当时全国 1 万人中只有 1 人受大专教育，学生极其宝贵，“为了国家建设前途，也为了储备作对军事更有价值的贡献，不应无分别的与一般壮丁一同抽调入伍，应该仍令受完大专教育而加以军事训练，遇将来必要时，再行征调”。^② 他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在 1938 年的《告全国学生书》中，陈立夫表示，“亡人国者必图亡其文化教育，以绝其复兴之凭藉……我国受教育之人数，本已较欧美各国为少”^③，因此不能为抗战而停顿学业，使差距更大。但他同时也声明两点：一是已达兵役年龄的学生，如果有志从军，可以办理手续就近加入中央军事学校及各地方依照中央方案特设的训练机构，接受专门训练；二是遇有国家需要，无论在何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应随时应国家征召。在教育部的组织下，1938 年，480 名青年学生进入政治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期满开赴前方。以后随着前方需求的增加，先分批征调了医科学生、工科学生、外国语系学生，共计 6371 人。1942 年后，战事激烈，单是征

①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 1994 年版，第 289 页。

②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 1994 年版，第 289 页。

③ 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教育通讯》创刊号，第 13 页。

用学生从事军事技术工作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教育部开始发起青年从军运动,一年内征召学生 15000 余人。1944 年冬更是达到高潮,教育部发动了波澜壮阔的十万青年从军运动,在中国教育史及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教育部长任内,陈立夫还在促进学术文化研究、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但是,陈立夫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有其消极甚至反动的一面,虽然其本人总是试图回避、掩饰,但他极力以党化教育加强国民党对教育的控制,在教育部配合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六 陈立夫执掌教育的消极影响

抗战爆发后,陈立夫兼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此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战区青年的宣传、组织与救济,与教育部的职责有相关之处。但是,陈立夫避而不谈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当时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为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稳固独裁统治,蒋介石力图在教育领域贯彻实施思想政治统制。陈立夫惟蒋马首是瞻,又是资深“党务专家”,自然是蒋的最佳人选。抗战伊始,教育界一时陷于混乱,蒋介石一面痛陈“从前教育的失败”,一面趁机将陈立夫安插到教育部,由此将教育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中。

陈立夫入主教育部后,首先确立了“以党治校”体制,强化各级学校的党团组织网络。他要求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与三青团团部,规定学校行政领导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并以资助科研、休假、进修等为“交换条件”,利诱普通教师加入国民党。为在学校中发展壮大三青团组织,陈立夫不惜专门训练一批工作人员,到各校宣传、鼓动,甚至亲自披挂上阵,频繁到“基层”演讲,拉拢青年学生集

体加入三青团。当时规定，国民党区党部协助学校行政，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工作。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要列席校务会议。这样，各级各类学校就处于国民党的监督管制之下。^①

其次，建立“训育”制度，加强对学校师生的思想控制。1938年，教育部公布了《青年训练大纲》；次年9月，又公布了《训育纲要》，规定从1940年起在中学实行导师制。要求导师充分利用一切时机，对所管学生进行训导，并作详细记载，每学期分两次报告训导处，并联系报告学生家长，严密监控学生的思想行动、学习及身心发展。《训育纲领》中规定12项“训育实施”内容，主要是“讲解三民主义要义”以及蒋介石的言行。同年，又颁布大专学校组织要点12项，规定各校除了原有的教务、总务处外，增设训导处，其主要任务是，统筹推行导师制的实施，主管战时学生资金救济、疾病照顾及征调等有关事务，指导学生思想行动，集中青年意志。实际上就是监督管理学生的思想言行。为此，陈立夫亲自起草了一篇《训育纲要》，呈交蒋介石核定后颁布施行。其要点是16个字：“自信信道，自治治事，自育育人，自卫卫国。”同时颁布全国所有学校的共同校训“礼义廉耻”四字。^②训育目的、内容以及方式的陈腐落后是显而易见的，如规定学生要“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③并将训练国民党党员的《党员十二守则》来要求学生，企图以此“改造人心，统一行动”。此举遭到学生的普遍抵制和反对。训育制度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曾悲叹：“能守纪律、重秩序，克尽本分，完成职责的青年，一定是寥寥无几，恐怕一百个

① 参见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② 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抗战岁月》，第148页。

③ 《训育大纲》，载《中等学校训育法令汇编》，四川教育厅1941年印刷。

青年还挑不出一个。”^①

第三，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限制学术自由。陈立夫毕竟是国民党党务的行家里手，深谙党化教育的套路。在竭力鼓噪改革教育，呼吁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乘机收缴各校原有的自主权，统一实行“部订”的“全新”教育规章制度，由此，经过蒋介石统治集团篡改的“三民主义”，便成为中国教育的最高基准；在统一大学课程的幌子下推出的“部颁”课程表里，“党义”、“军训”、“三民主义”、“理则学”等纷纷登台并成为主干课程；甚至从“部订”教科书、“部颁”学籍规则，到教师资格审查、教职聘任，乃至教师休假、进修、奖励等具体规定中，都把服从“领袖”、信仰“三民主义”作为重要依据。学校的各项学术活动均以拥戴“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准绳。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陈立夫在以后的回忆中，反复为自己辩解：“当时也有一部分学者专家，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实属误会。”^②

更为显见的是，在陈立夫的控制之下，教育部在各级学校严加防范“赤化”。即便是令其引以自豪的青年学生招致、救济工作，陈立夫也毫不讳言他的反共意图：“奔赴后方之青年学生，深信政府必能为之设法，若来而无人照顾，势必为共匪所勾引前往延安而不及补救，故虽花大量经费，亦属值得。”^③为达到防共、反共目的，同时也为了扩展其个人政治势力，陈立夫还想方设法将CC势力渗透于学校之中。CC特务在校园内大肆活动，对具有进步思想的师生进行迫害，施以绑架、逮捕，甚至杀害，激起广大师生的强烈愤

^① 《青年团工作的根本要旨》，《总裁言论选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第2072页。

^②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253页。

^③ 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抗战岁月》，第153页。

慨与反抗，也引发国际国内民主人士的反感和谴责。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陈立夫身为教育部长，从大局出发，立足长远，拟订教育政策、制定长远规划；迁播高校，保全中国高等教育；抚辑流亡学生，重振后方弦歌；扩展各级教育，改进并创建教育制度；收回“文化祖界”，发扬民族文化，凡此种种，使中国教育不仅没有因战争而停滞，相反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其个人贡献不可小视。但是，陈立夫借机控制教育，大搞思想统制，同样也是事实。功过是非，历史将给予公允的评价。

(作者张珊珍，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抗战时评》

李良志、史桂芳、裴匡一编著的《抗战时评》，作为《石头说话丛书》之一，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该书276千字，精选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期间，重要报刊所载与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日相关的时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